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主管

中外建筑

1997.3

双月刊

总第十一期


ZhongWaiJianZhu



羌族建筑随想三题

文●季富政

中心柱

建筑史论家张良皋教授认为西北氏羌之来历有如下观点：“中华民族的‘胚胎’在云南，中国民族的一切历史都只能从此开篇。元谋云南先民北迁的第一条路线最方便，同时也是最重要的路线是岷江河谷。我们姑称之为‘西线’”。据当代大学者任乃强先生考察，沿途水草丰美，又无险滩峡谷，人们很容易由此翻过岷山，到达甘肃黄土高原。这一支人成为后世遍布中国西北的氏羌。尽管任乃强先生主张氏羌源出西北，沿岷江河谷南迁，方向与本文主张相反（本文也不排斥在“交流”中的“回流”）。虽然张良皋教授没有一步对他的观点论证，但可以看出“氏羌南迁有迁徙过程中的交流和到达西北的回流。回流何处？任、张二先生观点是一致的，即南迁岷江上游河谷。即今羌族聚居地区。那么，这支民族是否保留北方游牧居住形态的遗制呢？张良皋教授接着说：“帐幕源于庐居，人们公认这是游牧民族的居住方式，中央一柱，四根绳索，就可顶起‘庐’，成为我国最古老的‘攒尖顶’。最早迁居西北的氏羌，不仅务农，也从事游牧。羌人的一支后裔是藏族。我们今天所见西藏民居平面基本形状如‘田’字，中间一根‘都柱’这只能从帐幕中找到原型。今天西藏民居式样显然是帐幕加以‘干栏化’，不过材料已是木石兼用，叫人不免看出其出于帐幕加干栏。帐幕的中柱成了中国古代双开间建筑中柱的先行者。帐幕由一柱很容易发展到双柱，双柱帐幕就是庑殿的前身。我国建筑很早就出现庑殿顶‘彝’的器盖作庑殿顶形，金文有的‘享’作，可见庑殿形状之出现甚至比歇山更早。周人的一部份群众是羌人，金文中的庑殿形状反映了羌人的居住形式。”

以上大段摘录于张良皋教授在《建筑与文化》书中《八方风雨会中州——论中国先民的迁徙定居与古代建筑的形成和传播》一文的叙述。此文谈到中国建筑“三原色”——干栏·窑洞·帐幕一节时作了上面精采的论述。梳理起来有如下几个要点。

- 一、帐幕——庐居（中有一柱）——攒尖顶。
- 二、藏民居的“都柱”来源羌帐幕中央柱。
- 三、木石兼用的藏民居是帐幕加以干栏化。
- 四、帐幕中柱是古代双开间建筑中柱之源。
- 五、古羌人的居住形式，由一柱发展成双柱帐幕，同时又

是庑殿的前身。

综上五点丰富内涵，不仅让人理会到攒尖顶，庑殿顶与古羌人帐幕中柱，双柱的关系。同时又洞悉了藏民居“都柱”之源起。不过藏人既然是羌人的一支后裔，那么古羌人直接繁衍的岷江上游羌人，在居住形式上是否延续了中柱，双柱的作法呢？由于过去对羌民居研究的空白，缺图少文的全面剖析。学者们是难以作出判断的。

今天我们从最具羌族历史与文化古老色彩的川西北茂县黑水河流域诸寨到岷江上游两岸和杂谷脑河下游地区诸寨遍访普查，羌民居几乎都保留了这一古老遗制。此不仅吻合了西北古羌人南迁过程中“分流”之前同属氏羌大系的说法。从建筑上亦充分证实了羌、藏两族的血缘关系。尤其在羌、藏建筑上谁更多的继承了帐幕遗制，甚至于在四川阿坝羌、藏两族建筑上究竟是谁影响谁的问题，展开了新的研究。

于此补插一个有趣的建筑现象，敦煌地处古羌人活动的地区，莫高窟北魏各窟中“具有前后二室，或在窟中央设一巨大中心柱，柱上有的雕刻佛像，有的刻成塔的形式。”无独有偶，凿窟于南北朝并直接由西北发展而来的四川广元皇泽寺摩崖造像中，也有中心柱的存在。

上述两点共同说明一个问题：南迁的羌、藏人都保留了帐幕中柱作法。就是外来宗教建筑中国化过程中，也融汇了帐幕中柱作法。

除此而外，由一柱发展成双柱的古羌人帐幕居住形式也深刻地影响羌族石砌住宅，凡稍微跨度在四米以上的空间，均有双柱出现，尤其是住宅主室内。至于木石兼作作为藏民居的帐幕干栏化特色也不独藏人才有，羌族住宅亦在此方面表现得更原始粗犷，更具干栏结合石砌特色。这就是为什么羌族住宅和藏族住宅在形貌上极为相似的根源，犹如姐妹流露出渊远的血缘关系。而内部结构在中心柱的问题揭示出来之后，更是由里到外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还值得一提是，大型帐幕若直径在5—8米之间，“在‘陶脑’（天井，睡幕顶天窗）下方顶有立柱2—4根”。此制也同时反映在羌族住宅中跨度较大的空间。

乾梭子

帐幕之形可延衍为攒尖之貌，其顶规范为四角，八角状。羌人自西北南迁岷江上游，其古风最纯为岷江支流黑水河下游区域。羌人住宅多有和碉楼统融一体。碉楼无论四角、六角、八角，其“角”称乾梭子。而“角”与“角”之间均为内收弧线，形同攒尖顶和帐幕顶边沿。“乾”相对于“坤”。亦阳相对阴。碉楼边角外凸成棱角，意会乾，故称乾梭子。有乾梭子的八角碉羌人亦有叫八封碉者。此可分为二说，一为羌人南迁仍过着游牧生活，帐幕仍在用，遂半游牧半定居半农状态，居住与防御形态必有帐幕延续，除中心柱是一种之外，外形之貌的模拟亦属情理之中。而此制多在羌人居住核心地区，临近汉人区域碉楼其边尽为直线亦可说明核心地区易于传承古风的纯正，纯正者，西北帐幕之制也。二为乾梭子与八封碉的称呼。古蜀自汉以来即为易学研究兴盛之地，道教传播无孔不入，“羌族地区除了自身的原始宗教之外，内地佛教和道教亦出于羌族山寨，这就形成了羌族原始宗教和外地传入的宗教同时并存的格局。那么，在选址造房，称谓评鉴事物具有决定性的羌人巫师，这类起作精神领袖作用的羌族社会地位最高的人。其经典无不处处受到道教影响，因此，以碉楼边角谓之曰“乾”，以八角碉谓之曰“八封碉”也就顺乎情理了，易于口碑。

有乾梭子的碉楼几乎都分布在1933年叠溪7.8级大地



震的周围,为什么大部巍然屹立没有垮塌,这与乾梭子和内收弧线平面增大受力作用有直接关系。而不少老宅四围石砌墙仿效此法者也具同样功能。显然这是当今建筑予以忽略的古制。

“堂屋”与主室

羌人借汉人堂屋之说喻比其主要活动空间,叶启荣教授亦把川西北藏居类似之室谓之主室。堂屋对还是主室对?

堂屋之谓为羌人民间称呼,主室之说为专家之书谓。显然,专家于藏居主要活动空间无确切沿袭的称呼情况下所结论的空间次序,具有建筑学上科学意义。里面隐含对堂屋之说的疑虑思绪。羌人同类空间谓之堂屋,恐怕一是羌人以主室谱构汉人“主室”即堂屋,以示住宅核心之意,其间忽略不计正房及堂屋对称两侧之房,纯以部份空间功能借意表达。二是汉人强加之词,羌人对主室和藏人对主室同样无传统稳定称谓,汉人便以堂屋呼之,久而久之即为羌人沿用,对讹传说,适成今词。诚然,称谓事小,空间事大。溯上可联想母系氏族社会半坡,姜寨之仰韶文化时代,近以羌人婚姻制度中保

留的一些母权制残余看(诸如姑舅表优先婚,招赘,寡妇再嫁,非婚子女不受歧视,入赘随女性等)。再以半坡遗址园,方房子平面布局及姜寨遗址聚落布局与今羌民居主室布置和羌寨聚落比较。其间诸多何其相似。尤以主室火炉(锅庄)之地位应为自古之制的核心。主室空间皆以此展开。火为文明之始祖,自半坡时代纳入室之后,便祭为神圣。羌人火炉常年不熄,祀为“万年火”已有宗教意义。后加四围成方坑,加高成方台,适有形制。并置于室中,以火炉角对屋角,屋角即为神位,泛称“角角神”。二者已有以角相连的轴线。此其一,其二,室中中心柱,无论一柱,二柱,四柱,均为对称尺度与火炉呼应。于是就构成了火炉与神位制约主室布局的主线。于是灶台、厨柜、火坑、火架、桌、凳都围绕其展开。试设想若去掉火炉。室内顿有无主脉之感,形制空泛,布局索然,空洞如野。如此高度集中人的活动和器物于一体的空间,只能追溯原始形态的仰韶时代,又由于有中心柱的帐幕制度遗址,恰正是一个半游牧半农业民族在居住形态发展上的必然。

(作者:西南交通大学建筑系副教授)

(上接第20页)将日益显性化,成就中蕴藏着失误,建设中包含着破坏”。(2)在设计队伍的交替和冲击论题中,不仅归纳了中国自身建筑师队伍的素质及面临的问题,还必须同时看到随着外国投资者的进入,境外设计事务所与国内设计公司合作的机会越来越多,北京在1993年统计,境外设计或合作设计的建成建筑就有50余栋。另据上海统计就1991—1996年间国际性投标的项目占投标总数的40%,仅95年参加上海大型工程招标的境外事务所即达53家115次。总体看来,这些事务所良莠不齐,鱼龙混杂。但其中不乏世界级的名建筑师,在许多他们所擅长的领域,如超高层,大型公共建筑,智能建筑,交通建筑等方面表现出较强的优势,但对已处于严酷竞争中的中国设计师们更是一种冲击和挑战。(3)马国馨大师进一步从建筑创作的反思和选择上论述了中国几十年建筑创作历程及其探索性,提出了几个深层次学术观点如多样化的表现及深层次的拓展;高新技术的风格和手法;对传统和表现传统的新认识等。

中方著名建筑设计的演讲令与会日本建筑专家连连称赞。勾通了与中国建筑师的交流。松原弘典建筑师演讲的题目是《从苏联看中国解放后的建筑》,他通过对北京与莫斯科的比较,探讨中国近代建筑具有的特征,并指出21世纪的建筑在北京。“今日北京城的建筑正不断被急速渗入的商业主义所浸化。……莫斯科也是这样,仅仅在此之前的驻外国企业的事务所多在宾馆,最近逐渐移至商业中心和出租办公室。从此可看出今后纽约式的多功能箱形高层建筑将代替莫斯科式的尖塔高层建筑。”

世界级建筑设计大师,日本建筑学家矶崎新演讲的题目是《从日本看到的解放以后的中国建筑》,作为设计大师及社会活动家他特从新中国建立的50、60、70、80、90年代一个时间阶段,分析了不同时间内中国革命历程对建设事业的要求,他高度评价了北京天安门广场及人民大会堂工程,他认为,在当今建筑繁荣

的日本尚找不到如此广阔、规划恰当的广场,中国规划设计大师真伟大。

石山修武建筑师在演讲中全面阐发他对中国建筑特色的认识。他认为“战后50年、日本的城市风景因施行美国式的标准化而呈现出单一化的现象。美国式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系统,磨灭了日本风土和文化的个性。另外,在住宅建筑被EC诸国称为‘兔子小屋’的同时,办公楼作为工作空间实现了极度现代化,使城市建筑的性质反差变得很极为明确。”他尤其告诫中国建筑师不要走日本人的旧路,要汲取日本建筑师的教训。他指出“中国的现代建筑在极短的时间里体验了日本的近代化史尤其是战后50年所经历的全过程、正面临着必须作出解答的问题。对于美式技术(汽车、电脑)的表现→取决于对玻璃幕墙、玻璃、金属是否能有效地构想出中国式技术的表现。经济与技术两方面是不存在国境的。这种地球性与中国对于独创性的希望之间的关系将有可能孕育出新的建筑样式。放眼海外,联想全球已成为中国的义务,中国建筑师责任重大。”

1997年5月1日晚《中日建筑师北京交流会》闭幕式上中方组织者何玉如教授做了总结发言,他认为“会议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日本建筑师通过参观、介绍,了解了中国解放后、特别是十大建筑的设计情况。我们希望听到日本建筑师的看法,不管是赞许的、批评的或误解的;我同意矶崎新先生对传统的看法——即从形式到空间、从单体到群体、从自身到环境不断追求天人合一的完美境界;这次会议开得很活跃,有演讲、有讨论,会上的、有会下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探讨。昨天会上曾谈到建筑教育问题,我认为不论是留学美国、日本、德国或苏联,不管他们接受那国文化,回国后只有植根于本民族文化,就能开拓新的天地,就能有所作为。”

(作者单位:北京市建筑设计院研究所所长,高级建筑师)